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杨梅酒

中午时杨梅到了,早晨才采的,用杨梅枝密密遮着日头送来了。在流水里冲干净,再在清水里泡一小会,去掉路上的暑气和急躁,才放到大口玻璃瓶里。大太阳地,明晃晃的,到小店买酒,才张口说要买上好的白酒,店员便拿手一指红星二锅头说,拿去泡杨梅最好。于是捧了酒回家。两星期后酒色初红,柔和清亮。去年六月,曾有少年时代的好友来访,我拿出白底子的小酒盏来,倒上去年的杨梅酒。在白瓷底子的衬托下,那酒的绯红色,倒好像我们少年时代面颊上的酡红。今日打电话去说,过十日可来喝酒。她沉默一下才说,真的,一年过去了。

仪式也在百乐门举行。老上海舞厅见证上海经济社会的历史变迁。上世纪30年代是上海舞厅的全盛时期,职业舞女数千,舞厅与影院、戏院在娱乐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曹禺的《日出》、于伶的《花溅泪》都是以舞女生活为素材写的著名剧作。抗战期间,一些人为了逃避现实,舞厅成为他们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去处。抗战胜利,上海光复,舞厅更加热闹起来。1947年国民党政府因内战失利,为整伤军纪,限令国内舞场全部停业,大批舞业人员失业,致使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舞潮案”,禁舞令被迫取消。至解放前夕,上海舞场计100多家,居国内各大城市之首。新中国成立后,舞业得以整治。随着政治运动不断,曾经盛极一时的上海舞厅逐步衰落。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交谊舞随改革开放

之一,建筑风格自成一统,外呈八角形,里面正中一个穹窿顶,顶下正对圆形舞池,四周雕梁画栋,古色古香,与洋派的百乐门舞厅风格迥异。英籍商人沙逊建造的仙乐斯舞宫,将古典风格与现代气派融为一体,被时人称为远东一流舞宫。新仙林舞厅前面有一个大花园,每逢夏季,花园里霓虹闪烁,红男绿女,美酒咖啡,轻歌曼舞,成为老上海最迷人的露天花园舞场。

老上海的舞厅

朱争平

奢靡浮华的老上海舞厅是时人神往的去处。透过这风花雪月的休闲场所,可以窥见上海娱乐业发展的历史轨迹。上海开埠后特殊的政治格局,形成了以英租界为核心的市中心区域,西藏路沿线成为上海的中央娱乐区。位于西藏路巴黎饭店内的黑猫舞厅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是老上海第一家独立经营的舞厅。此后,月宫、老大华、安乐宫、圣爱娜等舞厅相继开张。30年代,上海经济畸形繁荣,奢靡之风盛行,舞业迅速发展,西藏路被称为“舞场路”。

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新仙林是当时最具体表性的舞厅,被称为老上海的“四大歌舞厅”。中国商人顾联承于1932年投资70万两白银建造的百乐门舞厅号称“东方第一乐府”,最大舞池500多平方米,大舞池周围有可以随意分割的小舞池,供舞客习舞和幽会。舞池的地板用汽车钢板支托,富有弹性。室内冷暖空调,陈设豪华。广东商人江耀章1934年营建的大都会舞厅是老上海夜生活的地标



1300人的警卫部队,负责广州城内及郊区的治安。至于柏贵本人,没有联军委员会盖印,不得私自或以个人名义发布告示。不用说,这是个傀儡政权了。清政府得知叶名琛被逮后,另派了一个两广总督黄宗汉。在黄宗汉到岗前,两广总督及钦差大臣由柏贵暂理。看来柏贵混得不错,敌我双方都挺信任他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海战(二十七)

傀儡巡抚说柏贵

纪连海

收完了大片的豆子、玉米和芝麻,撒上一层牲畜粪,化肥,手扶拖拉机就“突突突”地开进庄稼地了。机屁股上,装了两面大铁犁,就像老母猪闷着头,龇牙咧嘴,从地头吃到地尾,偶尔也会使劲磨几下,吐出一嘟噜的庄稼根子,偶尔也会绊住那腿脚,老在原地打转转儿,逗得我们“哈哈”乱笑。爹狠狠踹了一下拖拉机说:“这可是我们的电牛啊!”有人问:“爷爷,它是男的还是女的?”爹想了想,非常严肃地回答:“都可以。”

被掰碎的土地(上)

蒋建伟

其实,我心里盼望它是个女的,将来能生一大堆的拖拉机。但是,爹的回答有他的道理:用不了三五天,这块地就要被别人租去,这辆跟了我们家十几年的“东方红”牌手扶拖拉机,也该退休了。大地上,娘说:“种地不赔钱,虽说种地有补贴,但除去种子、化肥、农药、浇水、除草等成本,一年到头,也不赚什么钱。不赚钱瞎忙活的事儿,只有傻子才肯干哩!”又说,“你种地种得再好,撑死了你一年赚个两千来块钱!可人家进城打工的话,一个月不管好歹,吃了喝了,每个人起码挣他个一两千块钱,要是两个呢?要是三个个棒劳动呢?”娘还想滔滔不绝地往下说,被爹的余光快速扫了一下,就立马闭了嘴。爹的这个动作,被我偶然捕捉到了,我懂他的意思,更理解他积攒在内心的愁闷。爹不是嫌娘嘴碎,爹是在心疼他的六七亩地呀!

说起来,这地在村子东南,叫东地,肥得淌油,种啥,啥肥,无论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最开始,这块地是十五生产队的,和我们十四队不沾边,七几年全村重新分地,好地赖地一拢堆儿,“啪”,这一大片东地就划归十四队了,虽说又搭上了北洼子那片赖地,但总算稀汤里捞了块肥肉。爷爷最穷,养了四五个小孩,而且对四邻是穷大方,加上他“老实猴”,做事有远见,所以呀,七拐八拐地就捞到了一小块东地、一大片北洼子地。等到麦收一罢,男女老少精芝麻、种玉米棒子的时候,爷爷就开始发愁了:这个家,甭看人最多,但大人只有两个,其他的,都是些虾兵蟹将,一个能阵前“扛枪”的劳动力也没有!怎么办?奶奶说:“有地就等于有了命,不管好歹,先活命吧!”有了这话,爷爷才算不愁,尽管庄稼种得再怎么好,但大人小孩再没饿过肚子。爷爷的爹最羡慕这个儿子,说他死了就埋这块地里,爷爷却强烈反对,说埋你太占耕地,耽误种庄稼。后来,爷爷的爹死后,没有埋在东地,奶奶也没有,他们想把这块好地留给子孙们。

到了爹和叔叔这一辈,中间先后分了两次地,第一回是三个姑姑还没出嫁,地亩一分没少;第二回是两家人相继添了人丁,减去死去的嫁走的几个,总数没变,又赶上十四队人数也没增加,也谈不上什么分地。倒是原来十几亩地,由一块变成了三块(爷爷奶奶健在,老两口种了一块),三块再变成两块(爷爷奶奶已去世),割麦杀秋,一年两季,不论怎么种,麦子还是麦子,绿豆还是绿豆,玉米还是玉米,红薯还是红薯,可就是不产金子银子。叔叔不甘心种地,早些年就开始跑车、跑生意、做城里建筑防水等等,只要能挣钱,什么都干,叔叔后来果然发财了,地不知不觉就荒了,草比庄稼长得高,那块地,被堂兄种了去。爹不同,考虑这考虑那,始终没有放弃那块东地,算起来,粮食年年没有少打,可就是不值几个人人民币。实际上呢,爹上过学,当个大队书记绰绰有余,许多人嫌他不会送礼,一辈子就是个修理地球的命,亏!每当这时候,爹总是笑笑,说如果他当上了,那么,现在的大队书记怎么办?后来,当我也做了别人的爹,我才知道当爹不易。爹是天!有爹在,才能保住全家人的命,可是,爹靠什么呢?我想,他靠的是土地,就是我们家的东地、北洼子地,他守了许多年,当了许多年的农民,土里摸爬滚打,打了许多年的粮食,老远就听见他身上的那股子土腥味儿,说一千,道一万,土地是爹的命根子啊!所以后来,我们家虽然没有发财,但有吃有喝。爹虽然不是上个世纪的“万元户”,但成为这个世纪的“万元户”也不赖,也可以一边干庄稼活,一边给北京的我打手机了。这中间,姐姐弟弟们也分别成家,选择在广东、苏州、平湖打工,我也只身闯北京,我们把两块地整个交给了爹娘。是啊,把地交给了爹娘,笑笑交给谁都放心啊。

广州陷落的第二天,虽然还没有抓着叶名琛,但额尔金就感觉有必要建立政府,重建广州的秩序了。广州人不讲自觉,逢乱必抢,英法联军更不讲自觉,参战就捞战利品。不管怎么说吧,额尔金要建立广州政权了。而且,这广州政权还得广州人自治。原因很简单,英法联军方面,懂得广东话的就两三个人,怎么统治广东省啊。1858年1月6日,英法夷人把柏贵与穆克德纳“请”到了观音山。

夷人对穆克德纳的印象是:“他是个大汉,身高几近6英尺,年约60岁;肥胖得出奇,几乎无法站直……他之所以身居高官,似乎主要是由于他拥有这么一副魁伟的身材,而不是其他什么德行。他是个最无关紧要的人物。他这个人对于政治上的任何举措都是可有可无的。”说来说去,这个将军就是个饭桶。没办法,人家先祖打下了江山,儿孙后代再饭桶白痴,都能封个将军呢。夷人对柏贵省长的印象倒是好一些:“行动举止和谈吐都习惯于宫廷中的礼仪规范。他为人精明强干,外貌坚强果断”,以至于英法的海军司令同时相中了他,认为他在任何方面都比老穆那个草包将军强多了。于是他们决定,在广州要利用柏贵维持秩序。

双方协商的结果,柏贵还做他的巡抚,巡抚衙门里设置一个联军委员会,由巴夏礼负责。英国拨100名士兵,法国拨30名,其他由中方配备,组织一个



柏贵

官员届到时巡抚衙门迎候,但是官员们觉悟很高,不来。所以柏贵下山时,迎接他的反而只能是洋人了,这样柏贵在广东就像洋人的客人了。

广州政权建立后,柏贵在英方的授意下,发了些关于中外互相和好的告示。按法国学者伯纳·布立昂所言,英国人很快给柏贵起了个外号:匹克威克。这是狄更斯笔下的人物——老男人、老绅士、老学者、老光棍——有些善良、有些迂腐的老好人。匹克威克这个老好人,这时候只能做双料间谍了,既得给夷人干,还得给清政府干。

什么。久居北京的臣子哪里知道这是农民为了消除疲劳在唱田山歌,于是就回答说农民在哭泣。由于用吴依软语吟唱的田山歌音调高亢,旋律起伏较大,经常出现八度的大跳进行,其他如三、五度的跳进也经常出现,而且多为散板散唱,因此形成较多的拖腔,听起来的确很像在呜呜啼哭。

在上海乃至江南地区的田山歌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一种叫做“大山歌”的演唱形式。所谓“大山歌”,主要是当地农民们在夏天耘稻、耨稻时为了缓解暑热,宣泄情绪而演唱的一种田歌形式,演唱时由7-8个人组成一个山歌班,其中一人担任领唱,其他几人轮流接唱,

流传四个世纪的田山歌

蔡丰明

江浙一带,拜访了诸多的歌手与当地的文化工作者。记得有一次我在常熟文化馆采访了一位在音乐方面颇有研究的地方工作者,他告诉我说田山歌作为一种生成传播于水稻田中的民歌样式,在音乐声腔上主要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特别高亢,有时甚至会用假嗓演唱,其二是略带悲怆,听起来颇有哀怨之感。这与我以前理解的民歌大多是欢快热闹的风格几乎大相径庭。说到田山歌的声腔,上海青浦一带还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乾隆皇帝来到青浦一带巡查,正值黄梅季节,田间农民时秧之时,沃野飘歌,不绝于耳。于是乾隆皇帝就问身边大臣这些农民在干



书法 殷志芳

美国西北角北林海市老朋友来信说,最近要在家开很大的派对,把市长也请来了。这个城市的华人并不多,何以请得动市长呢?他们的秘密是借用社会资源,弘扬中华文化,展现新一代华人的精神风貌。

美国的大城市,华人精英集中,人才济济,每逢喜庆佳节,唱歌的,跳舞的,一抓一大把,办中文学校,华人孩子就把课堂给坐满了。比如西雅图,华人合唱团就有好几个呢!北林海的中文学校主要是领养家庭的孩子,也没有华人合唱团。但是,每两年办一次春节音乐会,把一南一北,温哥华和西雅图的专业人士请过来。这还不够,当地西华大学音乐系的系主任也请来,每一届都登台指挥,让他的学生演奏中国音乐,演唱中国歌曲。这个音乐节现在已经办成北林海的旅游特色项目之一,吸引周边的观众前来观赏。

今年春天,当地华人积极参与了芭蕾舞团的《翡翠湾》演出,分文不取。这个剧本由西华大学教授撰写,反映一百年前,当地歧视迫害华人的爱情悲剧。华人提供了历史资料和中国舞蹈的片段。演出开幕式上,市长应邀出席,并接受华人意见,向历史上美国的错误表示道歉。这个道歉赶在国会道歉之前,是美国屈指可数的几个表示道歉的市长之一,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良心。当地华人协会趁热打铁,召开了感谢市长派对,让市政府触摸到华人社区的力量。面对面向市长提出对城市发展和提高华裔地位的各种想法,改变了很多华裔家庭“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冷漠态度。俗话说,四两拨千斤。北林海的华人没有大城市的优势,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请市长到家里来

融融

十日谈

“非遗”我见

评弹的传承靠的是口耳相传。